

# 推动自主发展：全球文明倡议下 中国对非洲治理援助<sup>\*</sup>

□ 宋 微

〔提 要〕全球文明倡议作为中国为国际社会贡献的又一重要公共产品，核心是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发展模式，以平等的方式推动文明间互鉴，尊重现代化发展的人民性。中国对非援助的核心与全球文明倡议的内核相契合。长期以来，中国把提升非洲自主发展能力作为对非援助的核心主题，在技术和治国理政方面为非洲提供援助，助推非洲实现自主发展。面对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叠加的冲击，中国对非治理援助也面临新的挑战。全球文明倡议为新时代中国开展对非治理援助提供了新思路，未来应在尊重文明多样性基础上，积极支持非洲走自主发展之路；在倡导平等互鉴基础上，优化治理援助项目评估；在坚持人民至上的前提下，重视培育非洲治理根基，提升非洲治理效能，助其实现自主发展。

〔关键词〕全球文明倡议、对非治理援助、中非关系、自主发展

〔作者简介〕宋微，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中图分类号〕D82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 8832 (2023) 3 期 0001-21

全球文明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后中国为国际社会贡献的又一重要公共产品，从根本上回答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对于前两个倡议如何

<sup>\*</sup>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对外援助促进中非共建‘一带一路’的理论与实践研究”（项目批准号：21BGJ033）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国际问题研究》编辑部提出的修改意见，感谢高滨熙、晏玥同学在写作过程中提供的帮助，文责自负。

实施的核心关切。作为发展领域的公共产品，三大倡议主要惠及对象是发展中国家，以推动发展中国家发展为引擎，进而带动全球复苏与增长。当前国际发展领域的主流观点认为治理能力低下是欠发达国家落后的根源。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西方主导的援助体系在发展中国家强制推行了一系列经济、政治改革。随着中国对非援助的规模和影响力逐步扩大，关于中国援助与非洲治理能力的关系一直被广泛讨论，主要研究路径有两个：一是从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竞争角度将中国援非动机妖魔化，如“共产主义扩张论”“漠视人权论”“新殖民主义论”等；<sup>[1]</sup>二是从回应质疑的角度，对中国对非援助政策和实践进行归纳和总结，研究方法主要是田野调研和比较分析。<sup>[2]</sup>然而，上述两种研究路径都无法回答中国如何认知非洲欠发达问题的根源，也无法回应以非洲为代表的欠发达国家对于中国提出系列发展倡议后的核心关切，即中国是否会通过援助对非洲进行模式输出。全球文明倡议不仅在理念上解读了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发展模式的核心主张，而且在实践中为中国对非治理援助提供了指导。

[1] 代表性研究包括：Alan Hutchison, *China's African Revolution*,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76; Ian Greig, *The Communist Challenge to Africa: An Analysis of Contemporary Soviet, Chinese and Cuban Policies*, Richmond: Foreign Affairs Pub, 1977; Warren Weinstein and Thomas H. Henriksen, *Soviet and Chinese Aid to African Nations*, New York: Praeger, 1980; Bartke Wolfgang, *The Economic Aid of the PR China to Developing and Socialist Countries*, München: K.G. Saur, 1989; Tull Denis, *The Reconfiguration of Political Order in Africa: A Case Study of North Kivu (DR Congo)*, Hamburg: Institute of African Affairs, 2005; Gill Bates and Yanzhong Huang, "Sources and Limits of Chinese 'soft Power'," *Survival*, No.2, 2006, pp.17-36; Ian Taylor, *China and Africa: Engagement and Compromise*, London: Routledge, 2006; Fareed Zakaria, *The Post-American World*, London: Penguin Books, 2011; Jeremy Garlick, "Michael Pillsbury. The Hundred-Year Marathon: China's Secret Strategy to Replace America as the Global Superpower," *Asian Affairs*, No.3, 2015, pp.543-544.

[2] 代表性研究包括：Giles Mohan and Marcus Power, "New African Choices?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Engagement," *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 Vol.35, No.115, 2008, pp.23-42; Brautigam Deborah, *The Dragons Gift: The Real Story of China in Afric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Carmody Pádraig Ristead, *The Rise of the BRICS in Africa: The Geopolitics of South-south Relations*, London: Zed Books, 2013; 李安山：《为中国正名：中国的非洲战略与国家形象》，《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4期，第6-15页；罗建波：《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对非外交：在分歧中寻求共识与合作》，《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4期；贺文萍：《中国援助非洲：发展特点、作用及面临的挑战》，《西亚非洲》2010年第7期；张忠祥：《试析中国对非洲外交中的不干涉内政原则》，《西亚非洲》2010年第1期；周瑾艳：《中英非和平安全合作的前景与挑战》，《国际展望》2016年第6期；张春：《涉非三方合作：中国何以作为？》，《西亚非洲》2017年第3期。

## 一、尊重自主选择：全球文明倡议的理念内核

在全球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日益加剧的背景下，非洲受援国的治理问题再度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在此背景上，如何提升非洲国家治理能力成为新时代中国对非援助必须面对的课题。全球文明倡议立足于“现代化之问”的中国方案，从根本上阐述了中国对世界发展的看法，同时也为新时代中国对非治理援助提供了理念指引。

### （一）现代化的核心是自主选择

治理水平低下是非洲欠发达的最主要原因，这已成为国际发展领域的共识。西方文明在崛起过程中，自觉将西方与非西方区隔，认为西方文明天然高人一等，制造了血腥的殖民灾难。20世纪80年代，国际发展援助的主导机构——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就二战后对发展中国家投入大量资金和技术但仍收效甚微的原因进行反思后，认为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不能帮助其发展起来的原因主要是政府贪污腐败和监管机制不健全，并提出“结构调整论”<sup>[1]</sup>。随后，西方国家开始大规模推动附带条件的援助模式，相关条件涉及政治体制改革、市场经济改革以及政府绩效等方面。冷战结束后，非洲国家被“第三波民主化”强行带入选举政治，不但没有实现预期的发展效果，反而深受部族冲突、军事政变、恐怖袭击、宗教矛盾等不稳定因素的困扰，甚至出现了索马里等“失效国家”和“脆弱国家”。

针对如何提升非洲治理能力，全球文明倡议强调尊重非洲国家的自主选择。习近平主席强调，“我们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sup>[2]</sup>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国家

[1] “结构调整论”认为在经济上实行市场经济政策，在政治上推行民主是发展中国家获得发展的基础，参见 Giles Mohan, *Structural Adjustment: Theory, Practice and Impacts*,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2] 《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中国政府网，2017年12月1日，[https://www.gov.cn/govweb/xinwen/2017-12/01/content\\_5243852.htm](https://www.gov.cn/govweb/xinwen/2017-12/01/content_5243852.htm)。

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冷战思维，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搞双重标准。”<sup>[1]</sup> 全球文明倡议强调“要秉持独立自主原则，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sup>[2]</sup> 并再一次明确，依据中国自身的发展经验，成功的发展模式必须符合本国国情和历史文化，国际社会应该尊重各国自主探索发展模式的权利。

## （二）平等互鉴是文明交往的方式

在价值判断方面，文明之间应该是平等的。国际发展援助起源于宗主国对殖民地的控制，因此对于如何看待受援国的文明形态，就不可避免地打上了“西方中心论”的烙印。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OECD/DAC）成员国看来，以非洲为主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只有按照西方探索的发展路径进行自我改造，才能走出蒙昧、实现发展。<sup>[3]</sup> 特别是冷战结束后，美国利用世界霸主地位，将西方价值观和制度包装成“普世价值”向第三世界发起攻势。<sup>[4]</sup> 而中国认为，“每一种文明都扎根于自己的生存土壤，凝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非凡智慧和精神追求，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人类只有肤色语言之别，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sup>[5]</sup> 每一种文明都是独特的，在文明问题上，生搬硬套、削足适履是有害的。因此，发达国家没有任何借口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模式横加指责，进行模式和价值观输出。

在交往方式上，文明之间应该相互学习。“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

[1]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求是网，2022年10月16日，[http://www.qstheory.cn/yaowen/2022-10/25/c\\_1129079926.htm](http://www.qstheory.cn/yaowen/2022-10/25/c_1129079926.htm)。

[2] 《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全文）》，新华网，2023年3月15日，[http://www.news.cn/politics/leaders/2023-03/15/c\\_1129434162.htm](http://www.news.cn/politics/leaders/2023-03/15/c_1129434162.htm)。

[3] Cheryl McEwan, *Postcolonialism and Development*, London: Routledge, 2009, p.122.

[4] 田文林：《百年大变局呼唤“新文明观”》，《当代世界》2023年第4期，第37页。

[5] 《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新华网，2019年5月15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9-05/15/c\\_1124497022.htm](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9-05/15/c_1124497022.htm)。

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sup>[1]</sup> 习近平强调，“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sup>[2]</sup> 基于此，全球文明倡议提出要尊重不同文明探索出的不同发展道路，鼓励互相借鉴，搭建平等对话的平台和网络，推动多层次、多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以共同发展塑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和新格局。

## （三）尊重文明发展的人民性

文明的终极表现是尊重自主选择，不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然而，长期以来，是否接受和实施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已成为西方国家衡量发展中国家是否“文明”的标尺，也是能否获得西方援助的关键考量。接受西方政治改革条件的非洲国家就能获得大量的资金支持，有独立发展规划的非洲国家或是被迫与西方交恶，或被归类为“失败国家”“流氓国家”。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直接反映出西方对自身发展模式的超级优越感——西方模式是唯一正确的模式，非西方模式是造成落后的根源。然而近年来，西方在非洲强势推进民主造成的动乱，促使一些非洲国家和政党在批判西方模式的同时，开始重新发掘早在20世纪民族解放运动过程中就逐渐形成的、与传统非洲社群主义相结合的社会主义理念和模式。<sup>[3]</sup> 在此背景下，中国始终立足于自身探索现代化的经验，将强调特殊性的“中国式”与强调一般性的“现代化”有机结合，鼓励非洲国家结合本国发展的挑战和诉求借鉴中国发展经验，强调“中国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不会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即使再强大也永远不称霸”。<sup>[4]</sup>

文明的终极关怀是以人为本，是否增进人民的福祉是衡量治理效能的根

[1] 《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新华网，2014年3月28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3/28/c\\_119982831\\_2.htm](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3/28/c_119982831_2.htm)。

[2] 《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全文）》。

[3] 邓延庭：《非洲去西方化转型发展中的社会主义探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2年第5期，第79-91页。

[4] 《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建设合作共赢美好世界——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4年6月29日，<http://cpc.people.com.cn/n/2014/0629/c64094-25214109.html>。

本标准。冷战结束后，世界爆发的战争和冲突大多发生在发展中国家，能否确保安全稳定的内外环境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治理效能，而且对于该国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至关重要。中国以人为本的发展道路证明了战争和掠夺不是实现发展的要件，“我们要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充分挖掘各国历史文化的时代价值，推动各国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sup>[1]</sup> 全球文明倡议倡导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只要坚持兼容并蓄、开放包容，人类文明就能不断发展繁荣”。<sup>[2]</sup> 鼓励发展中国家以发展惠及人民为出发点，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减贫与现代化发展路径。

## 二、提升自主发展能力：中国对非援助的核心主题

根据受援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与中国自身发展经验，中国对非援助呈现鲜明的阶段性特征，但尊重非洲国家主权、支持自主发展能力是贯穿始终的主题。

### （一）帮助新独立的非洲国家探索工业化（1956—1977年）

1955年4月召开的万隆会议增进了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相互了解，中国开始通过援助支持亚非拉民族解放事业。毛泽东直接将是否支持国际反帝运动上升到是否是合格共产党员的高度。<sup>[3]</sup> 周恩来也指出，中国愿意在自身经济建设的同时，尽量帮助刚独立的非洲国家发展经济。<sup>[4]</sup> 随后，周恩来于1964年首次访问非洲时宣布了中国对外援助八项原则，明确提出了中国援助充分尊重受援国主权，目的是帮助受援国走上自主发展道路的基本原则。

1964年12月，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中国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指引下，向（非洲）国家提供无偿援助、无息或者低息贷款，支持他们的民族解放运动和民族经济发展。<sup>[1]</sup>

因此，在援助领域的选择上，中国着重强调帮助非洲受援国建立工业体系。万隆会议后，中国领导人就对如何帮助非洲实现经济独立有了最初的想法。针对援助领域，周恩来着重强调，首先要帮助他们解决吃、穿、用问题，要重点援助农业和工业领域，既要满足眼前急需，也要着眼长远的发展规划。<sup>[2]</sup> 1958年，中共中央首次明确指示，要帮助受援国建立工业体系。<sup>[3]</sup> 对此，周恩来着重强调，中国援建的工业项目要以中小型规模为主、尽量加快施工，快速收获发展效应。<sup>[4]</sup> 1960年9月，几内亚总统杜尔访华，中、几两国政府签订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这是中国同非洲国家签订的第一个经济技术合作协定，规定中国向几内亚提供2250万卢布无息贷款，用于支持火柴厂、卷烟厂、水电站等项目。<sup>[5]</sup> 当时中国与几内亚对于贷款的使用也曾产生过不同意见，中方希望援助用于支持生产性项目，而几内亚希望中国也能支持建设议会大厦。后来双方经过多轮交涉，几内亚取消了议会大厦项目，得到了中国领导人的赞赏。<sup>[6]</sup> 同期，中国以无息贷款形式支持了其他非洲国家建设工业项目。中国支持建设的坦桑尼亚姆巴拉利农场机械化程度很高，中方专家采取边干边教的方式在生产实践中培训当地员工，获得坦桑尼亚人民的高度赞扬，他们认为：“农场为坦桑尼亚农业发展做出了榜样，不仅是粮食生

[1] 《政府工作报告》，《人民日报》1964年12月31日，第1-3版。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377页。

[3] 《中共中央批转陈毅、李富春〈关于加强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工作领导的请示报告〉》，中国经济网，2007年6月11日，[http://www.ce.cn/xwzx/gnsz/szyw/200706/11/t20070611\\_11690814.shtml](http://www.ce.cn/xwzx/gnsz/szyw/200706/11/t20070611_11690814.shtml)。

[4] 《方毅文集》，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1页。

[5] 石林主编：《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1页。

[6] 《李先念接见几内亚政府经济代表团时的谈话记录》，1963年4月27日。转引自李红喜：《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对非援助述论——以几内亚为例》，载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管理部主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个人课题成果集（2013年）》，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384页。

[1] 《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全文）》。

[2] 《习近平复信希腊学者》，新华网，2023年2月21日，[http://www.news.cn/politics/2023-02/21/c\\_1129382028.htm](http://www.news.cn/politics/2023-02/21/c_1129382028.htm)。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531页。

[4] 《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关于目前国际形势、我国外交政策和解放台湾问题的发言（之二）》，《人民日报》1956年6月29日，第2版。

产的基地，也是一所培养人才的学校”<sup>[1]</sup>。

中国援助为新独立的非洲国家建立了最基础的工业体系，有助于提升非洲的自主发展能力，赢得了非洲国家的支持。例如，中国援建的坦赞铁路项目有力地推动了非洲的民族独立自强，被非洲人民称为“友谊之路”<sup>[2]</sup>。

## （二）从微观层面提升非洲的技术水平（1978—2011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决策。同时，广大发展中国家基本完成了民族解放运动，发展经济、摆脱贫困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亟待解决的问题。

为此，中国进一步明确了推动非洲受援国自主发展、降低其对援助国依赖的指导思想。1979年7月，邓小平在第五次驻外使节会议上强调，对外援助要继续坚持八项原则，但具体的援助办法要根据实际情况有所改动，使受援国真正从援助中受益，而不是加重其对援助国的依赖。可以把部分无偿援助给成低息贷款，受援国自己要经济核算，从而提高援助资金的效用。<sup>[3]</sup>

关于援助方式，中国重点强调技术援助，提升受援国的造血能力。一是特别针对以往援建的基础设施项目在“交钥匙”之后，由于受援国缺乏管理经验导致项目运营不佳的问题，中国启动了全面的技术合作，提升受援国的运营管理能力。二是中国开始以开放的态度与联合国等国际机构开展三方合作，为非洲受援国提供技术培训。1983年至1994年有99个发展中国家和9个国际组织得到了中国与联合国发展机构共同提供的多、双边结合的援助，累计培训1500多名技术人员。<sup>[4]</sup>三是为了确保优惠贷款项目的偿还能力，中国加大对项目运营能力的支持。为拓展援助资金来源，1995年中国启动了优惠贷款的援助资金方式。与无息贷款不同，优惠贷款由政府贴息、不能免债，

因此为保障贷款能够按期收回，对项目预期经济效益要求较高。为此，中国开始推动中资企业与受援国企业间的深度合作，为当地培训了大批的管理和运营人才，提升了项目的收益能力。四是中国不断扩大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源开发合作。到20世纪80年代末，共有43个非洲国家向中国派遣了留学生，总人数达2245人。<sup>[1]</sup>自1998年开始在华举办多种类型的短期培训班或研修班，2000年中国设立了非洲人力资源开发基金，2004年中国在该基金基础上增加资金投入，设立对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部际协调机制。同年启动了派遣援外青年志愿者计划。2005年中国首次派出12名志愿者赴埃塞俄比亚工作。<sup>[2]</sup>

中国对外援助在经济层面推动了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深度合作。随着中国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外溢，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也获得了广泛认可。“北京共识”<sup>[3]</sup>受到了非洲国家的普遍好评，甚至在同美国结盟的非洲国家中，人们也赞赏中国发展模式的亮点。<sup>[4]</sup>

## （三）从宏观层面加强治国理政交流（2012年至今）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积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将加强治国理政交流作为发展对外关系的重要内容，积极推动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将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义利观作为中非治国理政经验交流的指导思想。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访问坦桑尼亚期间发表重要讲话，他用“真、实、亲、诚”四字箴言来诠释中非关系的真谛。关于“真”字，习近平主席指出，文明具有多样性，各国有着多样化的发展模式，应尊重多样的文明和

[1] 牛长松：《中国与非洲教育合作的新范式》，《比较教育研究》2010年第4期，第23页。

[2] 杨光主编：《中东非洲发展报告（2006—200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251页。

[3] “北京共识”是由《时代》杂志前外交事务编辑乔书亚·库珀·拉莫首先提出的，泛指中国不同于西方的对外投资、贸易和援助模式，特指中非之间特殊的发展合作模式。资料来源：Joshua Cooper Ramo, “The Beijing Consensus,” *Foreign Policy Centre*, 2004, pp.1-78.

[4] Karima Brown, “Mladlana Trumpets Chinese Labour Model,” *BD*, May 26, 2005; “China’s Growth Debunks Capitalist Myth,” *The Nation*, January 3, 2006.

[1] 石林：《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30-233页。

[2] Wei Song, “Seeking New Allies in Africa: China’s Policy towards Africa during the Cold War as Reflect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anzania-Zambia Railway,” *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No.1, 2015, p.59.

[3] 石林主编：《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第70页。

[4] 戴伦彰主编：《走向21世纪的中国对外经济关系》，中国物价出版社1997年版，第141页。

发展模式而不是以特定标准将其统一。中国支持非洲国家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中国愿意在治国理政方面同非洲国家经验共享，同时汲取中非双方古老文明的智慧和实践中的经验，实现中非共同繁荣。<sup>[1]</sup>随后在南非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时，习近平主席在主旨发言中指出，实现金砖国家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各国既要自力更生，又要团结协作。中国会继续增强与金砖五国的政治互信，共享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与金砖国家人民的传统友谊，实现互利共赢。中国与金砖国家在发展过程中要充分认识到发展规律，坚持创新与科学发展，努力解决发展过程中的困难，推动现代化进程。同时，中国与金砖国家还应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界银行等多边框架内加强配合与协调，维护共同利益。此后，习近平主席在“中阿合作论坛”“中拉合作论坛”上都表达了“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从各自古老文明和发展实践中汲取智慧”的愿望。<sup>[2]</sup>

在指导思想上，对非援助更加强调受援国的国家治理能力建设。2015年9月，习近平在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上宣布成立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该学院于2016年4月在北京大学挂牌成立，旨在总结分享中国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治国理政成功经验，帮助发展中国家培养政府管理高端人才，这是中国推动南南合作、促进共同繁荣的重要举措。

在执行上，中国对非洲治理能力建设覆盖了国际上关于非洲治理评价体系<sup>[3]</sup>的所有领域。在安全与法治领域，中国重视通过官员培训与非洲国家分

[1] 《习近平在坦桑尼亚尼雷尔国际会议中心发表演讲——中非永远做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外交部网站，2013年3月25日，[https://www.mfa.gov.cn/web/zyxw/201303/t20130325\\_322189.shtml](https://www.mfa.gov.cn/web/zyxw/201303/t20130325_322189.shtml)。

[2] 习近平：《弘扬丝路精神 深化中阿合作——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6月6日；习近平：《努力构建携手共进的命运共同体——在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领导人会晤上的主旨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7月19日。

[3] 针对如何评估非洲治理，国际社会发布了《易卜拉欣非洲国家治理指数》（Ibrahim Index of African Governance）对非洲国家的治理能力进行了全面评估。该指标体系将治理能力细分为四方面内容，“安全与法治”“参与和人权”“可持续发展机遇”“人类发展”等四个方面，又分别在这四大类别项下细分100个指标。资料来源：“2020 Ibrahim Index of African Governance: Key Findings,” November 25, 2020, <https://mo.ibrahim.foundation/news/2020/2020-ibrahim-index-african-governance-key-findings>。

享法治与问责经验。中国举办的“中非法律人才交流项目研修班”“非洲国家审计长研讨班”等项目为非洲国家更好适应时代发展需要提供中国的经验借鉴。在参与和人权领域，中国通过议会交流和参政能力培训，来提升非洲政党和少数族裔以及妇女等脆弱群体的参政议政能力。在2016年各国议会联盟第134届大会上宣布，中国正式签署面向议联的150万美元现汇援助协定<sup>[1]</sup>，未来也将陆续启动多项专题研讨项目，其中包括中国全国人大一议联“发展中国家议会能力建设”项目<sup>[2]</sup>，旨在分享中国经验，“进一步发展同亚非国家的南南合作，共同提升其自主发展能力”。同时，中国邀请非洲多元化政党团体来华参加政党高层干部研修班，帮助非洲国家净化政治生态，推动政党政治与国家统一相互促进。<sup>[3]</sup>中国也格外注重非洲妇女权益的保障，专门举办“非洲英语国家女官员参与社会管理能力建设研修班”等项目，分享中国在推进性别平等、妇女参与社会管理、保护妇女儿童权益方面的成果与经验。在培训内容上，中国也注重分享民族政策制定经验，推动非洲国家保护少数族裔利益、防止歧视。在可持续经济发展机遇领域，中国举办的“坦桑尼亚地方首长执政能力研修班”“‘非洲绿色长城’建设研修班”“非洲法语国家区域经济合作研修班”“2017年肯尼亚经济贸易研修班”“东南部非洲国家海关高级官员研修班”以及“港口规划建设与管理国际培训班”“南非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研修班”等项目，真诚无私地与非洲官员分享中国的专项治理经验，帮助非洲官员拓宽专业领域视野、打造服务型政府。<sup>[4]</sup>在人类发展领域，中国举办“坦噶尼喀湖共有水资源监管能力培训项目”“废水再

[1] 张德江：《共商合作 共促民主 共谋发展——在各国议会联盟第134届大会上的主旨发言》，《中国人大》2016年第7期，第4-5页。

[2] 《在对外交流研讨中描绘全过程人民民主画卷——全国人大对外专题研讨回眸》，中国人大网，2021年12月13日，<http://www.npc.gov.cn/npc/c30834/202112/f60ae081d20945629812cad102e7f81a.shtml>。

[3] 罗建波：《中非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与中非关系的全面提升》，《非洲研究》2016年第2期，第227-243页。

[4] 《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2021年1月10日，<http://www.scio.gov.cn/zfbps/32832/Document/1696685/1696685.htm>。

利用于森林培育项目”“干旱提前预警与适应系统项目”等环境相关主题培训，以及“中国与非洲国家医疗卫生公共管理标准化合作官员研修班”等公共卫生领域的相关培训，提升非洲技术官员在相关领域的治理能力，增进人民福祉。

### 三、中国对非治理援助面临的挑战

对非援助是中非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坚持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为非洲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将对非援助视为南南合作的重要实践，充分体现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中国对非援助包括在治理领域提供的支持助推非洲国家改善社会经济发展条件和提高自主发展能力。然而，随着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共振，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重新抬头，中国在非洲的治理援助也面临新的挑战。

#### （一）西方持续抹黑中国对非援助

随着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中非关系和中国对非援助日益成为美西方国家攻击中国对外政策的靶子。为牵制中国发展与非洲国家关系和遏制中国在非洲影响力的扩大，西方国家在舆论上对中国对非治理援助进行持续的污蔑、抹黑和攻击。西方国家认为，中国不附加条件的援助压缩了西方对非援助的空间，降低了西方援助在提升非洲治理能力方面的正外部性。例如，中国对非援助可能会与 DAC 的部分援助产生冲突，使得 DAC 国家对援助资金的监管难度增加，交易成本提高，降低 DAC 国家的交易效率。<sup>[1]</sup> 再如，不少西方国家批评中国不仅没有加入对津巴布韦的制裁反而继续向其提供大量援助，影响了津巴布韦的和平进程，不利于该国实现政治民主和良治。<sup>[2]</sup> 美国参议院外委会竟然把“中国在非洲：新殖民主义？”

[1] 叶成城：《从分歧到理性：西方学界眼中的中国对非洲援助》，《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1年第1期，第164页。

[2] Shuresh Moradi, "Hegemony and the Chinese Non-Interference Policy in Africa—a Friend or Foe?," *Chinese Studies*, No.3, 2019, pp.156–173.

作为听证议题，<sup>[1]</sup>集中讨论中国援助对美国提升非洲治理能力效果的冲击。一些西方媒体对中国对非援助大肆渲染，把中国的对外援助曲解为“新殖民主义”，妄称中国通过实施有针对性的经济援助来对受援国进行经贸乃至政治绑定。<sup>[2]</sup>甚至有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对非援助以自身利益为导向，以获取更多自然资源为目的，侵犯了非洲的人权并且无视非洲的法律法规。<sup>[3]</sup>

西方国家还指责中国援助助长了非洲的腐败。有西方学者称，中国对非洲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破坏了当地存在的规范，助长了腐败，<sup>[4]</sup>且中国援助项目数量较多的地区与较高的腐败认知度之间存在着强烈的关联。<sup>[5]</sup>中国援助易受到非洲受援国的政治俘获，从侧面阻碍了非洲的治理改善。西方抨击，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利用中国的援助来巩固权力，对反对派进行武力镇压，<sup>[6]</sup>同时穆塞韦尼还利用中国的参与和肯尼亚、卢旺达组成“自愿联盟”，在没有坦桑尼亚和布隆迪的情况下开展了备受瞩目的但有争议的区域一体化项目，以此在非洲区域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sup>[7]</sup>

#### （二）中国援助模式在非洲受到部分质疑

中国对非外交始终坚持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对非援助不附加任何条件，

[1] "China In Africa: The New Colonialism? Hearing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Africa, Global Health, Global Human Right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of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ne Hundred Fifteenth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Serial No.115-117, Washington: U.S. Govt. Print.Off., March 7, 2018.

[2] 《德语媒体：谁来抗衡中式新殖民主义？》，德国之声中文网，2022年4月18日，<https://p.dw.com/p/4A4VA>。

[3] T. L. Deych, "China in Africa: Neo-Colonial Power or 'Win-Win' Strategy?," *Outlines of Global Transformations: Politics, Economics, Law*, Vol.11, No.5, 2018, pp.119–141.

[4] Ann-Sofie Isaksson and Andreas Kotsadam, "Chinese Aid and Local Corruption,"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Vol.159, No.3, 2018, pp.146–159.

[5] Gina Kelly et al., "The Dragon's Curse? China, the World Bank, and Perceptions of Corruption in Tanzania," May 2016, <https://www.aiddata.org/publications/the-dragons-curse-china-the-world-bank-and-perceptions-of-corruption-in-tanzania>.

[6] David Whitehouse, "Uganda-China: Museveni Calls the Shots, Makes Civil Society Vanish," December 29, 2022, <https://www.theafricareport.com/271374/uganda-china-museveni-calls-the-shots-makes-civil-society-vanish>.

[7] Barney Walsh, *Ugandan Agency within China-Africa Relations: President Museveni and China's Foreign Policy in East Africa*,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2022, pp.73-91.

在平等互惠原则下与非洲国家发展经贸关系。这种援助模式得到非洲多数国家和民众的肯定。但随着国际和地区形势的发展变化，这种援助模式正受到部分非洲人的质疑。一方面，在西方舆论渲染下，中国援助不干涉内政的原则被描绘成非洲国家提高治理能力的障碍。一些非洲民众受西方蛊惑认为中国不干涉内政原则不利于改善当地的治理环境，有非洲学者希望中国可以改变不干涉内政的对非政策，在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适当增加“积极参与”的成分。<sup>[1]</sup>另一方面，中国向非洲国家分享发展和治理经验被解读是改变不干涉内政原则，试图扩大在非洲的政治影响。

为帮助非洲国家改善治理能力，中国通过举办多边和双边培训项目等方式向非洲国家分享治理经验，但实际效果受到质疑。由于在培训项目的招生环节主要依托受援国政府推荐，经常出现同一官员多次参训的情况；<sup>[2]</sup>有些非洲官员虽明确表示在中国学到的宏观经济治理经验非常适合本国并已应用，<sup>[3]</sup>但实际情况是该国根本没有出台相关政策。<sup>[4]</sup>同时，由于培训项目主要针对当地官员，受众面有限，导致很多非洲青年对中国治理模式和发展道路了解十分有限。根据非洲民调机构“非洲晴雨表”（Afrobarometer）2020年11月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非洲年轻人（18岁到35岁之间）更偏爱美国及其发展模式，在塞拉利昂喜欢美国模式的受访者达到55%，喜欢中国的只有13%。<sup>[5]</sup>

### （三）新冠疫情导致非洲治理能力透支

新冠疫情大流行对非洲造成了严重冲击，导致一些非洲国家固有矛盾凸显，治理危机加剧。西非地区军事政变发生频繁，政治不稳定加剧。突然暴发的新冠疫情导致非洲本已稀缺的公共资源骤然紧张，对于矿产资源的控制

权和外国财政的支持争夺成为部族矛盾、宗教矛盾以及边境冲突的爆发点。2021年初至今，非洲发生的政变和未遂政变相较于此前平均水平明显变多，2021年苏丹、马里、尼日尔、几内亚均发生过军事政变，<sup>[1]</sup>布基纳法索在2022年1月和9月相继发生军事政变。<sup>[2]</sup>频繁的军事政变加速了政权更迭，使得非洲国家的政治不稳定加剧，面临着更加严重的政治治理危机。另一方面，非洲大陆恐袭活动频率不断增加，给政治安全带来隐患。受疫情影响，国际社会对非洲恐怖主义势力的关注度降低，对反恐的投入有所减少，非洲恐怖主义势力有所回潮。马里、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等国发生多起恐怖袭击事件，非洲大湖区和莫桑比克北部成为新的暴恐重灾区。<sup>[3]</sup>恐怖主义给国家安全带来严重隐患，为非洲国家实现政治秩序稳定和良好的治理带来更大挑战。

疫情使非洲宏观经济环境遭到破坏，激化经济治理危机。受疫情影响，非洲宏观经济呈衰退趋势，疫情还暴露了非洲国家治理不善的问题，许多非洲国家面临严重的财政和外部失衡，公共债务负担加剧。<sup>[4]</sup>非洲经济衰退进一步反映出非洲经济治理能力薄弱的问题。疫情还在多个方面给非洲经济治理带来挑战，非洲农业、石油以及工矿业等领域均出现治理危机。由于一些国家实施了边境封闭措施，限制人员以及农业物资的流动，使得农业产业链中断，加剧粮食危机的风险。<sup>[5]</sup>石油和能矿领域受到严重冲击，因国际油价持续下跌，非洲石油出口国的原油收入损失约650亿美元。<sup>[6]</sup>

[1] 《中西部非洲今年政变频发，是“历史惯性”还是疫情放大了危机》，澎湃新闻，2021年11月12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5347639](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5347639)。

[2] 《布基纳法索国家概况》，外交部网站，2023年4月，[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fz\\_677316/1206\\_677462/1206x0\\_677464/](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fz_677316/1206_677462/1206x0_677464/)。

[3] 刘桓：《新冠疫情下的中非合作》，《中国外资》2021年第23期，第59页。

[4] Tarek Ben Ali and Ahmed Zidi, “Institutional Quality and Public Debt Accumulation: An Empirical Analysis,” *International Economic Journal*, Vol.31, No.3, 2017, pp.415–435.

[5] Daniel Kyalo Willy, Yacouba Diallo and Hippolyte Affognon, “COVID-19 Pandemic in Africa: Impacts on Agriculture and Emerging Policy Responses for Adaptation and Resilience Building,” May 1, 2020, [https://www.aatf-africa.org/wp-content/uploads/2021/02/TAAT-Policy-Working-Paper-on-COVID19\\_FINAL-for-Dissemination\\_May-2020.pdf/](https://www.aatf-africa.org/wp-content/uploads/2021/02/TAAT-Policy-Working-Paper-on-COVID19_FINAL-for-Dissemination_May-2020.pdf/).

[6] “Economic Report on Africa 2020,”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Africa, December 15, 2020, <https://www.uneca.org/era2020>.

[1] 《中国对非经济外交面临的挑战及政策工具创新》，中非合作论坛网站，2013年4月16日，[http://www.focac.org/lhyj/yjcg/201304/t20130416\\_7877485.htm](http://www.focac.org/lhyj/yjcg/201304/t20130416_7877485.htm)。

[2] 访谈中国商务部援外司官员，2018年3月。

[3] 在赞比亚首都卢萨卡访谈赞比亚官员，2017年6月。

[4] 在赞比亚首都卢萨卡访谈中资企业负责人，2017年6月。

[5] “AD407: Africans Regard China’s Influence as Significant and Positive, but Slipping,” November 17, 2020, <https://www.afrobarometer.org/publication/ad407-africans-regard-chinas-influence-significant-and-positive-slipping>.



疫情还导致非洲一体化进程停滞，区域治理遭到重创。一方面，新冠疫情使区域内贸易及人员流动受到阻碍，区域内贸易额下降，放缓了非洲大陆自贸区的发展进程。为遏制病毒在非洲大陆传播，各国采取了关闭边界、限制人员和投资流动等措施，跨境贸易中断，约占非洲贸易总额16.6%的内部贸易额大幅降低。<sup>[1]</sup>另一方面，受疫情影响，一些非洲国家对出口进行限制，使得区域内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势力抬头，区域内贸易自由化严重倒退。此外，一些非洲国家通过取消食品增值税和对粮食出口进行限制以保证本国的粮食安全，如2020年3月肯尼亚将所有商品的增值税从16%降至14%，2020年4月苏丹颁布了高粱出口禁令，以确保国内供应。<sup>[2]</sup>这些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可能加剧区域内成员国的矛盾，对区域一体化造成消极影响。

#### 四、全球文明倡议下中国对非治理援助实施路径

全球文明倡议以“四个共同倡导”为主要内容，即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为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中国方案。全球文明倡议源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与实践，并汲取各种文明的经验与教训，蕴含着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规律和实践逻辑，是新时代中国为应对人类共同挑战提供的又一重要科学解决方案。<sup>[3]</sup>立足于新时代中国推动非洲治理能力领域的成就与经验，结合当前中国在该领域面临的挑战，全球文明倡议为中国援助提升非洲治理效能提供了新的思路。

[1] 姚桂梅：《非洲大陆自贸区与中非经贸合作：影响与对策》，《当代世界》2021年第3期，第59-64页。

[2] Paul A Kiwumi, "COVID-19: A Threat to Food Security in Africa," UNCTAD, August 11, 2020, <https://unctad.org/news/covid-19-threat-food-security-africa>.

[3] 高翔：《揭示文明兴衰规律 擘画文明发展路径——全球文明倡议的理论意涵与实践价值》，《当代世界》2023年第4期。

#### （一）在尊重文明多样性基础上，积极支持非洲走自主发展之路

全球文明倡议强调不同文明没有优劣之分，只有特色之别，不同文明所孕育出的不同发展模式，可以在比较中取长补短，在交流互鉴中共同发展，绘就百花齐放的人类社会现代化新图景，从而不断丰富人类文明新形态，塑造世界文明新格局。<sup>[1]</sup>文明的多样性决定了选择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因此，对非治理援助要尊重非洲文明的独特性，支持非洲国家走自主发展之路。然而，西方国家经常以傲慢的姿态要求非洲国家套用西方发展模式，以援助为条件要求非洲国家采用西式民主。事实证明，强势推进和移植西方发展模式不仅没有使非洲国家走上现代化道路，反而带来了动荡不安的局面，由此产生的不满情绪还助长了恐怖主义滋生蔓延。

在探索现代化的道路上，非洲国家更加重视中国的经验。南非前总统卡莱马·莫特兰蒂表示，非洲与中国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很多领域可以互相学习、互相借鉴；中国消除绝对贫困为世界作出巨大贡献，激励非洲国家为此努力。加蓬民主党总书记办公室主任马丁·埃德齐马也表示，中国是非洲可靠的朋友，加蓬渴望学习中国式现代化的经验。<sup>[2]</sup>从政策实践角度，许多非洲官员提出了学习中国经验的重要性。例如，赞比亚商贸工部官员认为，中国的经贸合作区建设经验值得非洲国家借鉴学习；<sup>[3]</sup>安哥拉工商部官员认为，中国吸引外资的经验值得安哥拉借鉴，但是要结合安哥拉的实际进行修改和实施，不能直接复制。<sup>[4]</sup>

中国愿意与非洲国家交流发展经验，但绝不将自己的发展模式和价值理念强加于人。习近平主席指出，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既要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更要立足本国国情，具有本国特色。什么样的现代化最适合自己的，本

[1] 李远：《以深化交流互鉴开创全球文明发展新时代》，《当代世界》2023年第4期，第25页。

[2] 万字、刘军国：《“中国是非洲探索现代化发展道路上的好伙伴”》，《人民日报》2023年6月6日，第3版。

[3] 在赞比亚首都卢萨卡访谈赞比亚官员，2017年6月。

[4] 在安哥拉罗安达访谈安哥拉工商部官员，2018年6月。

国人民最有发言权。<sup>[1]</sup>在开展对非治理援助时也要注重非洲国家国情的特殊性，尊重非洲国家的自主性，要以尊重和平等的原则与非洲国家进行交流，开展真诚、客观的文明和发展模式探讨，从而解锁非洲变革治理模式的内驱力。中国的做法也赢得了非洲国家的认可。刚果（金）总理顾问姆文当卡·穆森戈认为，非中友谊历久弥坚，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尊重非洲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不将自己的价值观和发展模式强加于人，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与非洲国家开展交流合作。<sup>[2]</sup>未来中国应坚持这一基本政策，鼓励非洲国家独立探索自身发展道路。

## （二）在平等互鉴的基础上，优化治理援助项目的评估

开展对非治理援助要在平等的基础上了解非洲国家的需求，在交流互鉴过程中不断提升援助项目的针对性和有效性。非洲国家普遍治理能力较弱、缺乏政务公开机制，加强信息共享和交流，可以提高援助有效性和评估可信度，有助于中方了解非洲治理需求的同时更好地评估非洲接受经验转移的效果。特别是，对于能力建设项目而言，中国与非洲存在着社会历史、治理环境等差异，中国设计的培训方案在实施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即便是对非农业技术援助，也存在技术转移难题，<sup>[3]</sup>而对治理能力培训效果的评估更是难上加难。

因此，中国对非治理援助要取得良好的效果，必须对培训项目进行专业而完整的评估。在设置培训项目时要设立科学完备的评估标准，确立独立的项目评估机制，并加强评估结果的实际应用，弥补评估发现的不足之处。<sup>[4]</sup>首先要明确中国在治理能力培训项目上的权责分配。中国面向非洲国家的治理能力研修班主要由社会组织或事业单位承办，存在着权责划分不明或碎片

化的情况，可能导致项目招投标、培训过程甚至监管出现权责不明的问题。明确培训项目管理职权分配，能够更好地确保培训效果，减少因责任分配造成的资源浪费和培训效果不佳。

针对评估中发现的具体问题进行及时调整，保证项目的长期性和有效性。一是在培训项目设计层面加强对实施主体的问责，发挥受援国的主观能动性，提高受援国参与度和自主发展与自我监督意识。二是重视对培训项目招生环节的监督，与当地项目管理部门共同设置项目评估指标，加强受援国在接受援助过程中的责任意识。三是注重引入更多利益攸关方参与评估，采取不同层级不同主体不同平台的多角度联合评估，避免培训项目流于形式和项目进程中出现违规操作。同时在建立完善的培训项目评估机制过程中也要注意兼顾当地社会现状和文化特点，避免以国内治理能力指标为基础，简单复制评估标准，导致实际培训和应用中的适应性不足。

## （三）在坚持人民至上的前提下，重视培育非洲的治理根基

全球文明倡议坚守人民至上理念，突出现代化方向的人民性，“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进现代化最坚实的根基、最深厚的力量”。<sup>[1]</sup>因此，对非治理援助要高度重视非洲人民作为治理主体的力量。治理主体包括国家和社会，国家治理以制度建构和政府管理为主要方式，而社会治理则离不开社会组织的形成和完善。但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组织，人的力量都是核心。为提升政府能力建设，非洲成立了包括非洲行政培训和发展研究中心(CAFRAD)<sup>[2]</sup>在内的国际组织，中国可加强与 CAFRAD 等非洲本土机构的合作，支持和推进其为提高非洲政府治理能力进行的行动。非洲国家社会结构复杂多元，国家对于社会的管理能力有限，社会治理成为弥补国家能力不足的重要手段。相

[1] 《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全文）》。

[2] 万字、刘军国：《“中国是非洲探索现代化发展道路上的好伙伴”》。

[3] 袁晓慧：《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中非农业合作回顾与展望》，《国际经济合作》2022年第6期，第43-51页，第87-88页。

[4] 《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

[1] 《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全文）》。

[2] 泛非政府间组织(CAFRAD)于1964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支持下由非洲国家政府创建。它是非洲大陆第一个旨在改善非洲公共行政和治理系统的泛非培训和研究中心。CAFRAD目前有36个成员国，其总部位于摩洛哥的丹吉尔。资料来源：“PRÉSENTATION,” CAFRAD, <https://cafrad.international/presentation/>。

对于政府而言，社会组织代表的人群和参与的活动更具包容性，对于解决非洲经济和政治不平等有着更大的优势。基于此，中国对非治理援助可与非洲社会力量合作，推动和帮助中非民间组织建立友好关系，帮助非洲社会组织提升治理能力。

对非治理援助应格外重视非洲青年治理能力的提升。非洲拥有世界上最年轻的人口，非洲青年不仅是中国对非援助项目的主要参与者，更是推动非洲社会发展的重要主体。习近平主席指出：“青年是中非关系的希望所在。”<sup>[1]</sup> 关注非洲青年的成长不仅是构建更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的要求，更是加强非洲治理能力的必要条件。因此，中国对非治理援助应在教育层面为非洲青年赋能，助力非洲青年担当起国家治理和现代化建设的重任。通过教育领域的深度合作，中国可帮助非洲培养一大批具有全球化视野的青年，进而更好地为非洲发展提供人才支持。

中国对非治理援助从根本上是为了帮助非洲国家尽早摆脱贫困和加快现代化进程，让非洲人民过上好日子，这是中国对非治理援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优化对非治理援助，赋能青年、激发青年的治理和创新意识，这不仅可以帮助非洲夯实推进现代化的根基，还可以帮助非洲在提升治理能力过程中将守正和创新有机结合，从而让治理现代化真正内化为非洲人民的精神内核，持续、自主地推动国家治理效能的提升，增进人民福祉，提升人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为人类文明的百花园贡献非洲现代化的新图景。

## 五、结语

对于非洲的自主发展而言，加强对治理能力的培育是至关重要的一环。从历史视角出发，殖民者的到来为非洲历史发展进程打上了西方烙印。从奴

隶贸易、殖民统治到资源掠夺，非洲历史被西方话语不断地改写和扭曲。随后在民族独立解放浪潮与“第三波民主化”的进程中，西方宗主国又以西式发展路径和政策道路为非洲国家“铺路搭桥”。然而历经百年，非洲并未在西方道路引导下走出发展困境并实现减贫。因此，非洲国家将目光转向东方，对中国这一快速成长起来的新兴大国寄予厚望，希望从新的合作伙伴那里借鉴有别于西方的发展经验。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将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视为中国发展对外关系、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内容，希望通过交流互鉴和治理援助助推非洲现代化进程。在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冲击下，非洲治理能力面临更严峻的考验。作为被非洲国家寄予厚望的发展合作伙伴，中国将在全球文明倡议的指引下，继续坚持在平等基础上与非洲国家进行治理经验交流，在对象选择上更加注重培养非洲治理根基，在技术上优化评估和监督模式。相信在中非政治互信日益增强的背景之下，中国对非治理援助必将演化为非洲改革的内生动力。

【责任编辑：宁国辉】

[1] 习近平：《携手共命运 同心促发展——在二〇一八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中国政府网，2018年9月3日，[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8/content\\_5323084.htm](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8/content_5323084.htm)。